

到西柏坡上党史课

1973年,我在石家庄地区元氏师范学校文科专业学习。这年下半年,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,学校安排我们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学习。

6月21日,到西柏坡学习党史的全体师生举行了誓师大会。会后,我们高举着“元氏师范学校”的旗帜出发了。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石家庄市藁城县(今藁城区)梅花镇,在那里参观了“梅花惨案”旧址,

乘公交

乘公交,今天看似很平常的事,40多年前却不平常。那时,公交车少、人多、行程短。市区没几条公交线路,通车区域很小,出了这个区域只能靠步行。

那时,我家住在石家庄果树研究所(今学府路)家属院。当时这一带算郊区,不通公交车,唯一一趟公交2路车开到柳辛庄村南口(今胸科医院)就到了终点站,从终点站下车走七八里地才能到家。年轻时,我在市里上班,每次回家都得走回去。

1983年,儿子出生后,一位远房亲戚从外地赶来看望孩子,我去2路终点站接她。亲戚以为下车不远就到了,谁知走起来没完,累得她直怪我没说清。看她上了年纪走得很辛苦,我只好陪着她边走边歇才到家。

那个年代就是这样,不走没办法。没有别的交通工具,能挤上公交车已经不错了。 陈建民/文

并走访、听取了幸存者的诉说。在梅花镇停留两天后,队伍继续向西柏坡进发,途经石家庄市后,一些身体较弱的同学开始走不动了,有的脚上还起了血泡,大家纷纷劝其坐到队伍后边拉伙食用品和餐具的车上去,但他们谢绝了劝说,并说:“咱们是到西柏坡学习党史的,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‘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’的革命精神,轻伤不下火线,小小

的血泡算什么,就是爬也要爬到西柏坡。”这时,班里的宣传委员为鼓舞士气,带头唱起了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歌曲。一路行走一路歌,“七一”前夕,我们到达了西柏坡。

按照课程安排,我们先后到西柏坡和周边村的党中央机关旧址集中上课,并进行了参观、瞻仰等学习活动。

那时,我们五班的师生分别住在西柏坡和梁家沟村的

农户家里。课余时间,师生们每天主动为房东打扫院子、到山上打水,一个人担不动就两个人抬着水桶下山;周日不上课时,我们都不出去游山玩水,而是参加队里的各种生产劳动。

这次党史课历时3个月。学习党史,让我深刻地认识了党,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,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。

温振海/文

主动吃苦成就了我

1969年3月1日,16岁的我参军入伍。从那天起,我就暗下决心,以雷锋、王杰为榜样,到部队主动吃苦,当一个好兵。

新兵连训练刚结束,我所在的河北省军区唐山独立团换防来到保定,我们一营一连一排二班来到保定涞源县教场村的一个执勤点。我从来没见过山,单独在大山里站岗真是有点害怕,是榜样的力量和信念鼓励着我。除了军事任务要尽力做好外,我还主动找一些苦活、累活来做。我写信让家里邮来葵花籽和蓖麻籽,种在营房后面的山坡上。在山地挖坑又苦又累,往山坡上担水更苦更累。在连队执勤站岗5个月后,我被调到保定市一营卫生所当了卫生员。1970年5月20日,17岁的我被破格吸

收入党。1971年3月,我营在曲阳的连队卫生员复员,急需卫生员做保障。我主动申请,到曲阳山沟做了连队卫生员。这个连队有4个执勤点,离连部近的有20多里,远的有60多里。当时连队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,连长下去检查工作要骑车,班排长到连部开会也是骑车。我这个卫生员,按规定也可以骑车巡诊,可我坚持步行,背上出诊包,带上干粮、咸菜和水壶,近的要走3小时左右,远的要走7~8个小时。几乎每周至少一次要离开连部下去巡诊,这样一干就是一年。1972年3月,我被保送上了河北医科大学。大学期间,我照样主动吃苦,中午很少午休,晚自习学到11点是常事,早晨四五点还要起床早上自习。大学毕业时,医大四院领



本文作者主编的书籍

导找我谈话,要我留院工作,因我是军队学员便推辞了。

从1977年开始,我坚持业余时间学外语、写论文、做课题、编书籍。我主编的《实用骨折脱位诊治手册》的草稿,几乎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。我曾多次提前调级晋职,技术副团调正团,正常4年调整,我两年就上调了。主治医师晋升副主任医师,正常规定要5年,我3年就晋升了。回顾这几十年的部队经历,是主动吃苦成就了我。 白和平/文

朝花夕拾

一件白衬衫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们弟兄几个上学,母亲总是买一种布纹很粗、颜色泛黄、价格便宜的老白布,给我们做衬衫。

1964年夏天,学校组织我们参加支农劳动。中午休息时,我们几个同学躲过老师,跑到江边游泳。忽然,从东边开来一艘大客轮,我们一边踩水,一边面朝大客轮挥手叫喊。

突然,身后传来一片惊叫声。回头一看,原来是大客轮向上游行驶激起的浪涛,把我们放在岸边的衣裤、鞋子一齐卷进了江水里。

我眼疾手快,跃起身子,一把抓住正在江水中时隐时现的裤子,又潜水在近岸处摸回了塑料凉鞋。可是,那件母亲做的老白布衬衫却被江流冲得无影无踪。

上岸后,见我望着江水发呆,一位蔡姓同窗毫不犹豫地把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脱下来送给我,之后,他只穿着一件破旧的红背心在日头下割麦、插秧,完成了一周的支农劳动。

支农结束后回到家,不知是母亲早出晚归无暇顾及,还是故意视而不见,竟一直没有追究我的这一过失,让我躲过了一顿皮肉之苦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时常会想起这件事,总会为那艰苦岁月中真挚的同窗友谊而感动。

陈光新/文

进京参加课题研究

图说往事



1961年4月19日,我在石家庄市绝缘器材厂工作时,以特邀研究员的身份进京,参加了一机部北京电科院第三研究室的一项课题研究。我们精选并严格测试原材料品质、优选配方、多工艺试验,按国家标准检测研究结果,是一次比较完美的课题研究。这是我厂第一次同国内高级别的研究院合作,也是一次成功的厂、院合作。7月15日,课题研究结束。

图为5月1日,我(右三)与北京电科院的主研人员到北海游园时的合影。

底振臣/文并供图

初识甲鱼

1961年夏天,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去东牛各庄(唐山玉田县)的舅姥姥家。我俩从高道庄奔鸦鸿桥,到鸦鸿桥上河堤,往北一走就是东牛各庄了。到了舅姥姥家,母亲和舅姥姥、舅姥爷坐在炕上说事儿,四表姨带着我和小表舅,到庄前的大水坑边去玩。

一棵大柳树倒在水坑沿,树干扎进了坑里,足有大人的一搂粗,树冠像巨大的绿伞露出水面。“快来看!”四表姨喊道。我近前一看,只见柳树干上趴着两只大甲鱼,一只缩着脖子,一只伸着脖子,4只小眼睛像4颗绿豆。

甲鱼盖子有多大?细瞅瞅,比我家包饺子用的小盖板还大,背壳上还有波浪形的纹路。四表姨说它们是一公

一母,正在阳光下晒盖子。听庄里的老人说,它们已活了二三百岁了。

这一对大甲鱼是从哪里来的呢?四表姨告诉我,她听庄里人说,鸦鸿桥桥底下聚集着好多甲鱼。因为甲鱼有尖尖的牙齿,攻击性很强,谁也不敢碰它们。这对大甲鱼就是从鸦鸿桥大桥底下爬到这里安家落户的。四表姨还告诉我,它们经常出来晒盖子,也不怕人。

这次跟母亲去舅姥姥家,看见了甲鱼晒盖子,也算是不虚此行。

甲鱼,学名鳖,其肉鲜嫩,汤也好喝,是上等的滋补品。万万没想到,等我长大后干起了水产养殖,却与甲鱼打起了交道,为玉田县的甲鱼养殖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。 何允霞/文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
我们的价值观
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天津人郑国栋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